

## 北大與北大人——胡適先生

朱海濤

就在蔣校長那次召集的學生大會上，我們見到適之先生的氣度和他那種民主精神。當時他繼孟隣先生之後上台訓話，一開口，台下就起了鬨。反對他的（多半是左傾學生），踏脚，嘶叫，用喧鬧來蓋他的演講。擁護他的（多半是右派），用更高的聲音來維持秩序，來壓制反對者的喧嘩。頓時會場上緊張起來，形成了對壘的兩派，他的聲浪也就在兩派的叫囂中起伏着，斷斷續續送入我們的耳鼓。這是篇苦口婆心的勸導，但反對他的那些年青人卻紅着臉，直着頸子，幾乎是跳起來的迎面大聲喊道：「漢奸！」他也大聲，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：「這屋子裏沒有漢奸！」終其演講，這些年青人一直在給他當面難堪，而他始終保持着熱心誠懇，愷悌慈祥的聲音態度。這天給我的印象極深，我看到了一個教育家的氣度應當是多麼大；我也看到了適之先生的「能容」。——他的「能容」，是我早已聽說過的。

他有着寬闊的前額，這表現着寬闊的心胸。一付闊邊眼鏡，一付常笑的面容，使我們感到常是很愉快的。他似乎沒有悲觀或消極這兩種情緒存在，即使在最可慮的時候。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號前後的某一晚上，我從他家搭他的汽車回校，他用嚴肅的語調告訴我：「也許明天，五色旗就要掛出來，『華北國』就要宣佈了！」這話閃電似的打擊着我，我呆了，千萬道的憂思襲上心來，感到：「大禍終於來了！」車中的沉默更增加了我心上的壓力。到了北池子北頭，車停了，我下車來，他笑着說：「不要着急！——你怎麼沒穿外套呢？在北平得穿一件外套，不然，很容易傷風的。」果然，車外寒風吹得我

一噤，可是那語調的輕快，卻將我心中的寒冷減少了。

他家那時在米糧庫。米糧庫不失為一個文化人區域，短短的一節胡同，一號住着陳垣，傅斯年，三號住着梁思成，林徽英，四號住着適之先生。這是個很闊的大紅門，裏面一個很不小的栽滿花木的院子，北頭一座相當大的洋樓，這房屋的東家，大概過去很有點勢力，所以平台的石欄和小徑的瓦砌，都是從圓明園搬來的舊物。

在這樓房的西翼，連着一片一層的洋房，有很大的三間。那是適之先生的書房，裏面滿滿的都是書，據我看到西安現在的幾個公家圖書館藏書，沒有一個及到這一半的。他的書桌放在向南的那房裏，極大的一張，但上面紙張，書籍，文具，堆得像小山一樣，直到他寫東西的時候，只好將這些小山推推開，當中擠出一方尺左右的空隙放紙。可是這亂山叢中自有牠的條理，不論什麼東西，在適之先生自己要找時，絕對一找就着。這書房的最大忌諱是有個多事的人去替他整理書桌。如果有人這樣做了，那就適得其反，將條理系統都給破壞了。幸虧適之夫人是一位舊式女子，也不在乎這書桌的亂不亂。本來嗎，這三間書房自成單位，將通大樓的門一關，這就是適之先生的世界了。

向例，他起的是不很早的，通常在七八點鐘。吃了早點就去北大上課或辦公，午飯常有人請，下午仍舊辦公，或到校外辦事。晚飯更少在家吃，而且通常應酬完回家總在十一點鐘，這才到了他認真工作的時候。讀書，寫文章，就在這全家入睡，夜深人靜時。在兩點以前

睡覺是很少有的。遇到『獨立評論』要發稿時，那就更說不準了，也許四點睡，也許五點睡，甚至有時六點睡。這些我們都可以從他文章末尾所記的日期時刻看出來。不過他給大公報寫的星期論文卻是例外，因為要趕下午五點多鐘那班車送天津，所以總是星期六下午閉門謝客寫的。他寫文章卻不快，（這到底還是學者的作風，下筆慎重得很。）常常到了快開車時，看着表，叫小二（他的聽差，一個壯小伙子）騎車飛趕送到前門郵局去，有時甚至用汽車送。所以，雖然他很好寫評論政治的文章，但當有一時期申報請他去作主筆時，他終於拒絕了，因為他文章寫不快，這是和新聞記者條件不相合的。

他有一個本子，叫作『每天一首詩』，一頁一首，各朝各代的都有。每天他抄一首進去，是限定要背出來的。這大概是寫中國文學史的預備功夫吧。他也記日記，有時記得很長，有時記得很短。書桌抽斗裏有一大盒大大小小各樣各色的圖章，其中刻得最多的是：『只開風氣不爲師』。據說是提倡古文，辦甲寅雜誌的章士釗先生和他合攝了一張像，還題了一首白話詩贈他，大意是恭維他爲白話文大師，並說自己寫白話詩『算我老章投降了！』於是他答了一首七絕，其中一句就是：『只開風氣不爲師』。

到了禮拜日的上午，是他公開接見客人的時候，在他那會客室裏常坐滿一二十人，各種各色的人都有，有未識一面的，有很熟的，有老學究，也有共產黨青年。各種不同的問題提出來討論，延長到三四個鐘頭。他自己稱這個叫『做禮拜』。常常許多不知名的青年這樣認識了他，他也藉此和天下英雄『以談會友』。

適之先生在校中開的課是中國文學史和傳記研究，傳記研究是研究院課程，而且要繳幾萬字的論文，選修的較少。文學史則是一門極

叫座的課。他講『詩經』，講諸子，講『楚辭』，講漢晉古詩，都用現代的話來說明，逸趣橫生，常常弄到哄堂大笑。他對於老子的年代問題和錢賓四（穆）先生的意見不相合，有一次他憤然的說道：『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，我那會有什麼成見呢？』不過他的態度仍是很客觀的，當某一位同學告訴他錢先生的說法和他不合，究竟那一個對時，他答道：『在大學裏，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，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，看那一個合乎真理。』

在課堂上也常談論時局問題，但都是言之有物的。將該說的說了，就馬上開講正課，決不像有些教員借談時局而躲懶敷衍鐘點。在那種動盪的時間和地方，加以他的地位，絕對不談政治是不對的，所以他懇切的談。在他堂上有日本派來的留學生聽課，所以他的措詞當然是不失體的。

二十二年長城戰役後，他曾爲三十五軍（傅作義部）抗日陣亡將士寫了一篇白話文的碑記和墓銘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篇白話墓誌銘，由錢玄同先生寫了，刻成碑，立在大青山的烈士公墓上。二十四年夏他受傅將軍邀去綏遠旅行，那時正是中日『親善睦鄰』的時候，這碑奉軍委會北平分會之命封掉了。他們看着這被封的碑，『大家納悶，都有些傷心！』（二十四年夏他曾作一文評述河北事件，以此爲題。）於是寫了一首詩，說天有陰晴，時有否泰，最後兩句是：

『有朝祖國抬頭日，來寫青山第二碑！』

終於在他的駐美大使任內，日本走上了自殺的攻美之路。祖國在抬頭了，我們歡迎適之先生回來寫第二塊碑記！

三十二年二月九日晨一時零七分於西安五嶽廟